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与被迫长征

1933年下半年，蒋介石调集100万军队，自任总司令，准备发动对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他吸取过去失败的教训，强调实行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对根据地实行经济上严密封锁，在军事上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他首先以50万兵力，于9月下旬开始向中央根据地进攻。

中央革命根据地五次反“围剿”敌我力量对比

次序	国民党军队	中央红军	人数比例	反“围剿”的结果
第一次	10万	4万多	约2.5 : 1	胜利
第二次	20万	3万多	约7 : 1	胜利
第三次	30万	3万多	约10 : 1	胜利
第四次	30多万	7万多	约4 : 1	胜利
第五次	50万	8万多	约6 : 1	失败

这时，中央根据地主力红军已有八万多人。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不懂军事，把红军指挥大权交给共产国际派来的德国人李德。李德不了解中国实际情况，只是搬用正规的阵地战经验。他们放弃过去几次反“围剿”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实行军事冒险主义方针，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结果红军辗转于敌军的主力堡垒之间，陷于被动。在进攻遭受挫折后，他们又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和“短促突击”的战术，强令装备很差的红军同装备优良的国民党军队打阵地战、堡垒战，同敌人拼消耗。

当时出现过一次红军粉碎“围剿”的有利机会。曾在上海坚持抗日的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蒋光鼐等公开宣布抗日反蒋，于11月22日在福州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推李济深为主席。他们派代表同红军谈判合作，双方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

协定。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彭德怀等提出在军事上同十九路军进行配合，但博古等认为蔡廷锴等的抗日反蒋行动是“欺骗群众”，没有采取直接支援十九路军的行动。结果，孤立无援的十九路军在蒋介石的军事进攻和政治分化下很快失败。蒋介石在打败了十九路军后完成对中央根据地的四面包围。

1934年4月中下旬，国民党军队集中力量进攻广昌。博古、李德命令红军主力坚守广昌。经过18天血战，红军遭受重大伤亡，广昌失守。5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提出了红军不能打破敌人“围剿”情况下的两个方案：（一）留苏区坚持进行游击战争；（二）将主力撤到另一个战场。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减轻国民党军队对中央根据地的压力，7月上旬，红七军团改编为北上抗日先遣队，开赴闽浙皖赣边区活动。红七军团同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会合后，组成红十军团，并成立以方志敏为主席的军政委员会。在国民党军队的重兵追堵下，1935年1月底，红十军团遭受严重损失，方志敏被俘。

1934年9月上旬，各路敌军加紧对中央根据地中心地区发动进攻，中央红军已无在原地扭转战局的可能。9月17日，博古致电共产国际，报告红军主力准备实施战略转移。9月30日，共产国际复电同意。但是，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领导人仍没有适时作出转变战略方针的决断，战略转移的准备工作只在极少数中央领导人中秘密地进行。为筹划战略转移事宜，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三人团”中，政治上由博古作主，军事上由李德作主，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施。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导致我们党在红区的力量损失了90%，在白区的力量几乎损失了100%，中央红军主力被迫实行战略

转移，开始进行长征。

思考：中央红军主力为什么要进行战略转移？

1933年9月，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起第五次“围剿”。这个时期，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我们党内占据了统治地位。他脱离中国革命实际，否认敌强我弱的基本形势，要求红军采取积极进攻的路线，主张攻打中心城市，以实现革命在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同时，“左”倾教条主义在组织上主要表现为“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军事上则是军事冒险主义。

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左”倾领导者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使红军在战略上完全陷入被动。当时红军的战法是“堡垒战、阵地战与短促突击”，和优势敌人拼消耗。这种打法只有军事实力对等的情况下才有效。蒋介石集全国的财力和军力于一身，而中央红军只有不到十万人，加上苏区财力物力有限，劣势显而易见。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面临失败，党和红军陷入严重的生存危机。

在粉碎敌人“围剿”已经不可能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在1934年5月提出了战略转移的设想，并报告了共产国际。10月中旬，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8.6万余人，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了长征。“左”倾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极其严重。它导致除陕甘以外各主要根据地的丢失和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组织的严重破坏。这个教训是惨痛的。

中国革命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20世纪20年代后期、30年代前中期，中国共产党内屡次出现“左”倾错误。从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之前，“左”倾错误先后三次在党中央的领导机关取得了统治地位。

第一，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错误（1927年11月至1928年4月）。

八七会议后成立了以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三人为党委的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当时他们认为革命形势在不断高涨，盲目要求“创造总暴动的局面”。1927年11月在上海召开的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发展了八七会议以来“左”的情绪，以“左”倾盲动主义为指导，最终使得广州起义遭到失败。12月广州起义的失败使瞿秋白等中央领导人有所觉悟，及时发现并纠正了“左”倾盲动错误，并在1928年三四月间的临时常委会上作了自我批评，在实践中基本结束了全国范围内的“左”倾盲动错误。

第二，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1930年6月至9月）。

1930年6月，因受共产国际“左”倾错误理论和反右倾斗争影响，以李立三（宣传部长）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占了统治地位。6月11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案。“左”倾冒险主义主要表现在对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他认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都到了大决战的前夜。“中国经济政治的根本危机，在全国任何一处都是同样继续尖锐化，没有丝毫根本的差别。”“总的形势，都表明中国新的革命高潮已经逼近到我们的前面了”，全国范围内已有“直接革命的形势”，并“有极大的可能转变成为全国革命的胜利”。他还认为：中国革命一爆发，就有“掀起全世界的大革命、全世界最后的阶级决战到来的可能”。坚持“城市中心论”，强调“无产阶级的伟大斗争，是决定胜负的力量，没有工人阶级的罢工高潮，没有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决不能有一省与几省

的胜利”，批评“以乡村包围城市”是一种“极错误的观念”。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认定“资产阶级已经是反动联盟的一部分”，主张革命如果在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要没收中国资产阶级的工厂、企业、银行”，并且“必然需要从工农专政进到无产阶级专政”。他要求各路红军“会师武汉，饮马长江”，但结果损失惨重，先后有11个省委机关遭到破坏，武汉、南京等城市的党组织几乎全部被瓦解，红军在进攻大城市时也损失惨重。1930年9月24日，瞿秋白、周恩来回国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左”的估计，停止了组织城市暴动和红军进攻大城市的冒险计划，恢复了党、团、工会的独立组织。会上，李立三作了自我批评，承认了错误，接着便离开中央的领导岗位，前往苏联学习和接受进一步检查。

第三，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1931年1月至1935年1月）。

1931年1月，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取得了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推行“左”倾教条主义的方针政策。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主要表现为：在革命性质和统一战线问题上，混淆革命性质，将民族资产阶级当作最危险的敌人；在革命道路问题上，坚持以城市为中心，主张红军配合攻打中心城市。低估了根据地建设和农村游击战的重要性，夸大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和革命主观力量的发展，号召全党准备决战；在土地问题上，推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极“左”政策；在组织上，大搞任人唯亲的宗派主义和惩办主义，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军事上，强调所谓的“正规化”“正规战”“全线出击”，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退却中的逃

跑主义。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了严重危害。在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思想的指挥下，“左”倾错误在根据地得到了全面贯彻，直接导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南方各根据地相继丧失。这次错误使红军和根据地损失了90%，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力量几乎损失了100%，其教训是极其惨痛而又深刻的。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三次严重“左”倾错误，给中国革命带来巨大灾难和损失，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受到排挤。党内连续出现“左”倾错误的原因包括：

第一，从党的自身建设方面来说，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准备不足，理论素养不高，实践经验也很缺乏，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不了解，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的实践没有统一的理解，不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全面地、正确地结合起来。

第二，从社会根源上来说，中国社会状况是两头小、中间大，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少，小资产阶级是汪洋大海，而党员大部分出身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处于小资产阶级的包围之中。小资产阶级的“急性病”“幼稚病”有比较深厚的社会基础。小资产阶级在思想方法上往往主观片面，在政治倾向上易于左右摇摆，遇到问题容易走向极端。党内连续产生“左”倾错误的根源也正在于此。

第三，从以往纠正错误的方法和结果来看，八七会议以后党内一直存在着的“左”倾情绪始终没有得到认真的清理。纠正第一、二次“左”倾错误的方法有缺点，太着重个人责任，只注重组织处理，没有在思想上彻底弄清错误的实质，没有使干部在思想上彻底了解

当时错误的原因、环境和改正此种错误的详细办法，以致重犯类似的错误。

第四，从外部因素来说，共产国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颇深并进行了不适当的干预，党内教条主义倾向盛行，最终把八七会议以来党内的“左”倾思想和“左”倾情绪推向了极致。